

喘息、咳唾、心悸、心痛，舌苔白，寸脉沉细、关尺沉紧等症。胸痹的主要病机是上焦阳虚，阴气上逆。正如仲师所说：“脉当取太过不及，阳微阴弦，即胸痹而痛，所以然者，责其极虚也，今阳虚知在上焦，所以胸痹心痛者，以其阴弦故也。”此方以瓜蒌宽胸降气，消痰开结为主药。薤白辛苦性温而滑利，能通痹闭著之气为辅药。白酒味辛性温，活血通痹，宣发助阳，通行营卫为佐药。三药合用，能助胸中阳气，开上焦痹滞，使胸中阳气布达，胸中大气一转，浊阴之气下降，阳行痹通，诸症自然消除。

第2方瓜蒌薤白半夏汤，是在前方基础上加半夏而成。主治胸痹兼有不得卧，心痛彻背，舌苔白厚或白厚而腻，脉象弦滑等症者。此为痰有痰浊壅盛所致，故加半夏除痰降逆。

第3方枳实薤白桂枝汤（又名瓜蒌薤白桂枝汤），是在第2方基础上，去白酒加枳实、厚朴、桂枝而成。主治胸痹有心中痞气，气结在胸，胸满，胁下逆抢心而痛之症者。此证为客气留结在胸中，不只上焦阳虚而痹塞，且致中焦之阳气不行而生痞滞，阴邪得以留据而上逆动膈，抢心而痛。故又加枳实性沉降、除痞气；厚朴开气结、除满胀；桂枝行阳兼疏肝。诸药合用，不但胸阳得畅，而中焦亦调，故诸症自除。仲师在本条中又说：“人参汤亦主之”。细观人参汤（人参、甘草、干姜、白术）之组成，实即理中汤之意。乃告诉后人，若遇中阳不足兼见中焦阳虚证者，可随证选用。一证二方，随证而施，更体现出辨证论治精神的深邃。从这些方剂的主治中，可以体会到，胸痹的虚，为胸中阳气虚微而不振，致阴邪痹阻结室。故治疗不必用补，而是用宣通行阳，开痹降浊之法，使胸中阳气宣畅布达则清阳盛、浊阴退、痹塞开，而病除。所以我认为瓜蒌薤白剂是以行阳为主，并非补阳。即使所谈“人参汤亦主之”，亦是温补中阳、理中焦，不是补胸阳。由此可以体会到胸中大气为全身之主，大气正常运转，实为生死第一关键。

我在临床上治疗以胸背痛为主要症状的疾病，如冠心病、心肌梗塞、心肌炎、心绞痛、胸肋神经痛等病症时，常把本篇第1、2、3方结合在一起，随证加减，灵活运用。将我的常用方介绍如下：

全瓜蒌 30~40 g，薤白 12~15 g，半夏 10 g，枳实 6~10 g，厚朴 10 g，桂枝 6~10 g，檀香 6~9 g（后下），红花 10 g，丹参 12~15 g，茯神 30 g，炒五灵脂 12 g，蒲黄 10 g（布包）。药煎好后，临服前兑入米醋 20~30 ml。嗜酒者，也可不用醋，兑入绍兴黄酒 20~30 ml。心胸疼痛严重或发作频繁者，可再加苏合香丸，

每次1丸，1日2次，随汤药服。以本方做为基础，随证加减，每收良效。

中日友好医院（北京 100029）焦树德（杜甫云整理）

对“女子以肝为先天”的评议

“女子以肝为先天”，我见于《临证指南医案》“调经门”秦天一的按语中，明以前治妇科者似未有此说法。后人揣摩、援引，大率皆据女子以血为主而肝藏血，其导源似来自《宣明论》“妇人以血脏为基本也”，对其理论之是非，尚无深入探究。

所谓“先天”，其含义：1. 先生生而与生俱来；2. 在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彻始彻终起着主导作用。这两点只有肾（精）才具备。“肝”并没有以上特点。王肯堂引《素问·病机气宜保命集》说：“妇人，童幼天癸未行之间，皆属少阴；天癸既行，皆属厥阴；天癸既绝，乃属太阴经也。治胎产之病从厥阴者，是祖气生化之源也。”是说以“天癸”为女子生理进程三阶段的主线而分别有所侧重。肝在妇科中最主要的意义为“肝”和“血”，“肝”和“郁”两方面。肝和血属于生理性的一面，肝和郁则主要属于心理性的一面。

生理方面：“乙癸同源”，肝有赖于肾阴的资生，两者均有相火。其实是“肾命相火”寄旺于肝。所谓“同源”，主要是“相火”体系上的联系。冲、任隶于肝（肾）；冲脉起于胞中，其出入皆并少阴经以行，称为血海。任脉也为阴脉之海，同足厥阴、太阴、少阴并行腹里。这两条奇经和生殖系统有密切关系，而且在解剖部位上和肝肾二经联络，这就是冲、任隶于肝（肾）在生理上的依据。肝喜条达，主疏泄，如违其性，则成“郁”证。

心理方面，这即“肝”与“郁”的问题。人的具体心理状态除性别外，还有生活环境、文化教育、人生遭际、社会地位等综合作用所造成。首先，古代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地位，加之生活环境的狭小，社会接触受极大的限制，是产生心理抑郁的根源。另外，文化教育的被剥夺，容易形成心性偏狭；又易受鬼神迷信思想影响。古代妇女谈不到有什么社会地位，使其产生卑微感、依附感，举动言笑都得合乎“妇道”。可见古代妇女何以易生“郁”病，以及“郁”之为病与肝的重要关联。“郁”伤肝，肝伤“郁”，病理心理双关的恶性循环和肝为血脏，“女子以血为主”的特点，使古代医家极易着眼于“肝”在妇科学上的重要性，以致他们把“肝”强调为“女子先天”的地位。

临床方面：近年国内对妇科病治法归纳为健脾、

调肝、补肾、活血化瘀4种方法。调肝只是其一。古人治带下按五色分治， ㄱ 治带从肝论治者也少，往往从脾、肾、湿论治。不孕症而需要治“肝”的也仅居五型之一。傅青主《女科》“安奠二天汤”治妊娠腹痛，胎动如坠，认为“脾为后天，肾为先天。脾非先天之气不能化，肾非后天之气不能生。……补先后二天之脾与肾，正所以固胎之气与血。”也没有涉及到“肝”。

总之，以上未能获得“肝”为“女子先天”一说的证明。

安徽省荣军医院(安徽 233400) 汤万春

“血肉有情”考略

血肉有情之品，是指动物药中具有补益精血作用的药味。早在《黄帝内经素问》中，就有“毒药攻邪，五谷为养，五畜为益，五果为助，五菜为充”的记载，其中的“五畜”，王冰注谓：“牛羊豕犬鸡也”。《内经》方中，有用“雀卵和鲍鱼汁”者，仲景《金匮要略》当归生姜羊肉汤用羊肉，《神农本草经》所载之雁肪、丹雄鸡、鹿茸、白马茎、牛角鳃等，均为血肉有情之品的嚆矢。唐代孙思邈《千金食治》载可作食疗的鸟兽虫鱼更多至40种。此后，宋代官修方书也都载有“食治篇”，有关内容益加丰富，蔚成大观。

“血肉有情”的提法，最早见于何书？向来很少有人探究。依笔者管见，首推唐代孙思邈《千金要方》。其书卷9“风毒脚气”门虎骨酒条下，有云：“虎啸风生，龙吟云起，此亦有情与无情相感。”“有情”，这里指虎骨，“无情”，系指邪风。其后，明代韩忭（飞霞）《韩氏医通》“异类有情丸”条下，更明确地提出：“鹿，阳也；龟，阴也。血气有情，各从其类，非金石草木例也。”清代叶天士进而指出：“夫精血皆有形，以草木无情之物为补益，声气必不相应；”只有“血肉有情之品”，质重味厚，才能有“栽培身内之精血”，“充养身重形质”的作用。除了历代沿用的羊肉、鹿茸、羊肾、人乳、龟板胶、鹿角胶、牛羊髓、坎炁、紫河车等之外，江南所产之黄鳝、淡菜、海参、鲍鱼也出现在他的处方中，成为别具特色的虚劳用药。自此，血肉有情之品便更加广泛地用于临床，成为中医食疗与药疗相结合的一个特色。

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(北京 100091)何绍奇

杂谈麻黄清里热的体会

余在临床实践中，不仅用麻黄治疗风寒表证，更

用于里热实证，藉发汗以退热，颇效，兹略述体会。

余取麻黄治里热主要原因一是，它具有宣散的作用。二是，麻黄之宣透发散，乃是通过发汗而散邪。一向认为凡里热郁蒸病在气分者，其汗出而热不解。何以汗出而热不解？余认为乃是热之宣散不透，里热仍盛。

余用麻黄清里热的体会之一：麻黄治里热证的适应证必须选择好。麻黄清里热的作用并非能统治一切里热，余根据麻黄具有发汗、止咳、平喘、利尿的作用，所以取用麻黄清里热主要适用于肺热，尤其是痰热蕴肺之里热，麻杏石甘汤的拟定，正是为此而设。在此最佳适应证的基础上予以推延，风湿热证也颇合拍。麻黄治此之枢机，诚如李时珍曰：“盖皮毛外闭，则邪热内攻，故用麻黄，引出营分之邪。”总之，余使用麻黄清里热之适应证，掌握邪系湿热或痰热，必有湿邪或痰浊之相杂，则麻黄利水发汗之用，可尽其所能；病位则在肺卫为宜，因肺合皮毛，经络相通，更利其里热之透达。若系温热之邪所致，其本身已有热灼伤阴之势，若再以麻黄透汗，重耗其津实非所宜；若病已入肝肾下焦，则宜引邪下行，也非发汗宣透所宜，故此两者之里热，皆非麻黄之适应证。

体会之二：麻黄之用量要大。一般用量为10g。因麻黄发汗，用于表证是开泄腠理皮毛，近浅于肤，少量药力即可，而要透达里热，麻黄需入里剔邪，药轻不易深入；里热需麻黄托表而泄，药重始能托邪外出。初曾虑其药重量大是否有汗大泄而致耗阴之弊，实践证明，药后大多汗出津津，少数患者药后汗出较多，但其汗为热汗，身热随汗泄而降，随之病情退而感舒适，无津伤气耗之弊。在用药热降之后，尚须注意持续原量使用数天，若因其热退而彻减剂量，则有热降复起之情，尤其是湿热相杂湿重于热者，反复之情更多，这必须待汗泄湿祛、腻苔见退之后，则热退之效始可稳固。

体会之三：麻黄需他药相伍，助其清解里热的一臂之力，相辅之药，当随其病邪及病位之轻重不同而有所选择。从病邪而论，大别主要有湿热两邪，凡热邪偏重者，可辅以太膏，石膏是为清里热之要药，但石膏无发汗之力，今麻、石相伍，麻黄借石膏清热之力更壮，石膏藉麻黄发汗之能泄热更快，两药相得益彰；若系湿邪偏盛者，其在肺之痰湿，可用杏仁，麻黄宣泄肺气，与杏仁相辅相成，共同宣达痰热；若其湿蕴系由脾虚所酿成，则佐白术健脾除湿。诚然，里热之证尚有其他之兼症，也当随症加味。

上海市中医文献馆(上海 200020) 潘文奎